

第二章 東正教的歷史與舊禮儀派的發展

本章分三節，第一節簡要敘述俄羅斯東正教在尼康宗教改革前的重要歷史事件，以及尼康教改之因和教會分裂成舊禮儀派與政府教會的情形。第二節對舊禮儀派從產生到近代的發展情況，教堂派(поповщина)與反教堂派(беспоповщина)在各地形成的精神信仰中心，作一背景的描述。第三節是蘇聯時期東正教會的發展，主要是無神論對宗教信仰的打擊。在諾索夫經歷異象的年代，是信仰失落的「科學無神論」的時期，雖無舊禮儀派在此一時期的詳盡歷史紀錄資料，但從政府教會面臨共產政權的高壓逼迫，也可間接推斷出舊禮儀派信仰所處的困境。¹

第一節 尼康宗教改革與舊禮儀派的出現

大部分歷史學者認為，基輔羅斯接受了基督信仰，²也就是希臘的東正教，在俄國歷史上的影響及重要性，是從西元 988 年基輔大公弗拉基米爾 (Князь Владимир, 980—1015 年) 受洗之後，³直至今日都關係著俄國的命運。

發生於十七世紀的東正教分裂是俄國史上的一次悲劇性事件，在俄國教會史上更是最悲劇性的事件。學者包利斯 烏斯賓斯基(Uspensky Boris A.)在其 十七世紀的分裂與文化衝突 一文的開頭便指出這是教會史上的大事。⁴沙霍夫(Шахов М.О.)在《舊禮儀派的哲學觀點》一書中也寫到，導

¹二十世紀上葉舊禮儀派作家基林 (Килин А.К.)，在其《舊禮儀派信徒的思想與思維方式》中描寫了善良之人是如何謹慎維護信仰的：我們在節慶或是每個禮拜日祈禱，但是都相當的戒慎恐懼，祈禱之處的門窗，都用棉被與枕頭塞住，害怕不要被某些人聽到我們在祈禱，因為宗教是受到壓迫的。Бахтина О.Н., *Старообрядче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и традиции христианского понимания слова*.с.210.

²西元 1054 年之前，東方基督教會尚未全然與西方羅馬天主教分裂時，俄羅斯接受的是東方基督教。之後才稱為俄羅斯的東正教 (русское православие)。

³雖然追溯俄羅斯東正教的根源性與傳播歷史，有早自西元二世紀彼得的兄弟安德列在去羅馬的途中，曾到過俄羅斯之說，但是這個故事尚待保留。然而在基輔大公弗拉基米爾正式接受基督教之前，俄國由於早已和拜占庭聯繫往來，已經有貴族、商人和武士領洗進教。如王公伊格爾的妻子奧莉加於西元 955 年訪問希臘時，拜占庭的皇帝與牧首就為她舉行洗禮。不過學者認為 988 年仍有其代表性。

⁴Uspensky Boris A., "The schism and cultural conflict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致分裂的宗教改革的悲劇在於，進行藉曲解以返正的嘗試，宣稱被曲解的唯一⁵是正確且可行的，而所有背離它的，都是應當全力消滅的邪惡和異端。⁶隨著尼康的教改，起而反對的是以阿瓦庫姆為首的舊禮儀派。他們從原來的東正教會脫離，並受迫害到成為少數，但至今仍過著自己堅持的信仰及生活。以下將分別討論十七世紀宗教改革前的俄國教會，尼康的宗教改革與反對改革的舊禮儀派的出現。

一、宗教改革前的俄國教會

俄羅斯接受東正教，也使得俄羅斯的發展，與歐洲西方的發展出現隔絕。雖然受洗之初，羅斯對東西方的態度並沒有明顯的差別，它仍被看做基督教大家庭的一員，同西方的政經文化交往頗為頻繁。但是西元 1054 年，基督教世界分為對立的東西兩教會—希臘東正教和羅馬天主教。羅斯作為東正教世界的成員，在教義上宣布不承認天主教會並與它作戰。羅馬教皇不止一次想使俄羅斯東正教教會隸屬於自己的管轄，但始終沒有成功。例如第三次東征的十字軍（1188-1192）轉向波羅的海和芬蘭灣時，羅馬教皇要求附近的多神信仰和東正教信徒們信仰聖彼得，積極進行天主教思想滲透，好使西方封建主得以順利地控制該地區。這一企圖直接損害了羅斯的利益，羅斯同西方的關係驟然惡化。為了穩住自己的陣地，羅斯加緊在北部和西北地區普及東正教。十三世紀初，羅斯同西方長期保持的經濟和文化聯繫幾乎蕩然無存。韃靼蒙古人長達兩個半世紀的統治進一步拉大了羅斯同西歐文明的距離。在俄羅斯中央集權制國家形成後，為了加強世俗政權，統治者不斷向人民灌輸君權神授的思想。按照東正教教義，君權神授強調王公的權力來自上帝，任何人不能強行掠奪，違背上帝的意旨就會受到懲罰。同時，也要求王公向人民和上帝負責，不可濫用職權。⁷因此，東西方長期的隔絕，在彼得改革之時，就顯示出舊傳統的影響性。然

translated by Stephen Batalden, in the book *Seeking God: The recovery of religious identity in orthodox Russia, Ukraine, and Georgia*. edited by Stephen Batalden, Nor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1993 p.106.

⁵指希臘教會已受天主教思想影響之儀式，已經失去東正教的純潔性與正統性。

⁶Шахов М.О., *Философские аспекты староверия*.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кий Дом «Третий Рим», 1997. с.35-36.

⁷戴桂菊，《俄國東正教會改革（1861—1917）》。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頁 33-34。

而東西雙方爭執的問題至今仍然是俄國社會問題所需考慮的重點，而十七世紀宗教的分裂，當然也與此相關。

十五世紀俄羅斯教會與拜占庭的關係出現轉折，由於民族意識的覺醒，大公們不願在宗教事務上依附別的國家。他們開始為擺脫拜占庭皇帝和君士坦丁堡牧首區的控制而努力。西元 1439 年，在佛羅倫薩舉行基督教合併的會議上(Флорентийский собор)，拜占庭帝國同意東正教會與羅馬天主教會聯合。原本就與天主教對立的東正教會，如今卻因為拜占庭帝國生命受威脅而藉合一來求援，對俄羅斯東正教會當然無法接受。作為東正教純淨性的守護者，俄羅斯教會反對合併的決議。於是俄羅斯教會不再接受由君士坦丁堡牧首區派來的都主教，而從自己本國的神職人員來任命全俄羅斯的都主教。會議後十四年，遠離正信而想合一的拜占庭帝國，被土耳其人所滅，君士坦丁堡牧首區對俄羅斯的影響也隨之減低。西元 1458 年，以基輔為中心的西南羅斯都主教區同意接受拜占庭都主教的管理。至此，俄羅斯教會便分成兩個：西南羅斯仍直屬於君士坦丁堡牧首區，而以莫斯科都主教區為代表的東北羅斯實際上已經實現了內部管理的自治。⁸

(一)「第三羅馬」(Третий Рим)

「第一羅馬(即古羅馬)由於缺乏信心而衰落，第二羅馬(即君士坦丁堡)由於同瀆神的拉丁教會締結合併協定而陷落，如今領導普世教會的歷史重擔已經落在第三羅馬(即新羅馬)的肩上，這個第三羅馬就是莫斯科，他是第一羅馬和第二羅馬的繼承者，也是最後一個羅馬，而第四羅馬是不會有的。因為第三羅馬無限忠於東正教，所以它是萬古長存的。」⁹

這是普斯科夫(Псков)修道院的院長菲洛費(игумен Филофей)，在莫斯科將成為東正教世界中心時，向瓦西里三世(Василий)，1505—1533 年在

⁸前上註，頁 60。

⁹潘克拉托娃主編，《蘇聯通史》。第 1 卷，三聯書店，1978 年，頁 262；克雷維烈夫，《宗教史》(俄文版)，上卷。莫斯科：思想出版社，1975 年，頁 379。轉引自樂峰，《東正教史》，頁 112。

位)上書，提出的「第三羅馬」觀念。¹⁰第三羅馬的觀念，究竟在政治的影響層面比較大，還是更有其宗教的意涵存在，各方看法不一。事實上，「第三羅馬」的觀念確實造就了莫斯科國家權力與沙皇專制政權之優越性，而且此種觀念賦予俄羅斯的宗教使命感—彌賽亞的精神—其中影響也無法估算。十七世紀的舊禮儀派信徒就是以俄羅斯的本位主義出發來詮釋第三羅馬的觀念，維護俄羅斯傳統，形成與尼康為首的國教派相互對立的分裂局面。¹¹根據津可夫斯基(ЗеньковскийС.А.)的說法，菲洛費的理論的特色在於預言性與末世精神。一切的歷史將會依照上帝所喜悅和先知所言的方式進行，世界歷史的存在，在時間上是有定數的，俄羅斯將是在歷史上最後一個王國，若王國滅亡了，世界也跟著滅亡。如此一來，「第三羅馬」的觀念就滲入了末世的情緒和世界即將終結的信仰。¹²

(二)「百章會議」(Стоглав)

西元 1551 年，在都主教馬卡利(митрополит Макарий)的積極勸說下，伊凡四世宣布召開一次全國性的宗教會議，也就是後來所謂的「百章會議」。¹³雖然會議在解決教會內部的關係問題時，存在著許多不完善的地方，但是，會議的召開仍具有十分重大的意義。會議本著克服和減少缺陷的原則，對俄國教會生活的各方面都做了重新考察，使俄國的宗教禮儀、教規和管理教會事務逐步地被納入法制化的軌道。東正教成為受國家保護、提倡和支持的合法宗教組織。「百章會議」是俄羅斯君主制國家的宗教

¹⁰第三羅馬的觀念形成是漸進的，隨著拜占庭帝國的滅亡，1492 年的世界末日預言的未實現，以及象徵最神聖尊榮的白色僧帽(белый клубук)，已來到了俄羅斯，於是俄羅斯開始肩負起護衛基督教(東正教)純正性的神聖的使命。

¹¹陳妍伶，〈十七世紀俄羅斯東正教改革與分裂之探討〉，碩士論文，淡江大學俄羅斯研究所，頁 28,90。

¹²Шахов М.О., *Философские аспекты староверия* с.27.

¹³ 1551 年俄國宗教會議上簽署的文件最初稱為《宗教法典》或《沙皇和高級神職人員法典》。自十六世紀末起，人們根據決議條款的數量將這次會議的文件稱作《百章決議》，這次宗教會議也因此被稱作「百章會議」。其實，百章決議在內容上並不是分為整整 100 章，而是 101 章，每一章都包含若干組問答形式。會議的目的是要解決俄國東正教事務中已經積累的許多問題，如培養神職人員的學校嚴重不足；東正教徒甚至部分神職人員仍然崇尚迷信因而對東正教教義進行曲解；各地教堂在舉行聖事時、祈禱詞、讚美詩及聖歌使用混亂，沒有統一的規章可循；教會管理無序；國民及神職人員的道德水平下降；教會的領地不斷膨脹等。這些問題同時困擾著教會高級神職人員和世俗的統治者。參見《10—20 世紀的俄羅斯法律》第 2 卷，頁 253-258，莫斯科，1984；戴桂菊，《俄國東正教會改革(1861—1917)》，頁 53。

生活走向規範化的開端。俄國史學家、君主制積極擁護者卡拉姆津(Карамзин Н.М., 1766~1826)認為：「這是一次頗具歷史意義的會議。從會議內容的重要性上看，它比以往在基輔、弗拉基米爾和莫斯科舉行的任何一次宗教會議都高出一籌。雖然「百章會議」中的某些規定在後來的莫斯科宗教會議(1666~1667)上被廢除。¹⁴但是，多數決定仍長期為世俗和教會人士遵守。直到牧首制被取消，「百章會議」才失去實際意義。¹⁵

(三) 自選牧首

西元 1589 年 1 月，莫斯科都主教區晉升為莫斯科和全俄羅斯東正教牧首區，都主教約夫(Иов, 1589—1605 年任職)當選為全俄羅斯第一任牧首。在牧首就職儀式上，君士坦丁堡牧首伊葉列米(Иеремий)對沙皇費多爾(Феодор)強調俄羅斯作為「第三羅馬」的神聖使命。俄國沙皇對君士坦丁堡牧首的話十分滿意，認為這是對俄國成為羅馬帝國的真正繼承人的最後承認。西元 1593 年，普世東正教會的各牧首共同簽署法律文告，承認俄國教會永遠享有東正教牧首區的權力並將全羅斯牧首區排在普世東正教牧首區中的第五位。¹⁶正當俄羅斯東正教經歷各種考驗以及混亂時期之後，日漸發展與壯大，卻由於尼康的教改，讓教會面臨悲劇性的分裂。

二、尼康的宗教改革

沙皇阿列克謝依 米哈依爾維奇(Алексей Михайлович)年輕時，因為牧首就是自己的父親約瑟夫(Иосиф, 1642—1652 任職)，而成立了「愛上帝社」(кружок боголюбцев)和「虔信社」(ревнителеев благочестия)。神父涅羅諾夫(Неронов)、阿瓦庫姆，甚至後來的牧首尼康都加入。這些社團是為了使社會及教會的生活符合「第三羅馬」的理想，以及生活神聖化的目的。

¹⁴舊禮儀派的人堅持不應對百章會議的決定有所更動，但是尼康改革派輕視決議的意義，並懷疑決議的真實性。舊禮儀派認為百章會議並沒有帶進新的傳統，而是強調遵守舊有的及普遍採用的儀式之必要性。參閱 Шахов М.О., *Философские аспекты староверия*. с.29.

¹⁵尼 米 卡拉姆津，《俄羅斯國家史》(12 卷本)。第 8 卷，圖拉，1993 年，頁 484。轉引自戴桂菊，《俄國東正教會改革(1861—1917)》，頁 56。

¹⁶戴桂菊，《俄國東正教會改革(1861—1917)》，62 頁。前四個牧首區分別為：亞歷山大里亞、安提阿、耶路撒冷和君士坦丁堡。

他們致力於使混亂的儀式能夠統一，並在白衣神職人員以及信徒間加強宗教教育，而高層的神職人員，由於耽於荒淫，立即就成為社團的敵對者。社團同意沙皇所喜愛的尼康成為牧首，因為認為是與他們同一方。不過當尼康就任後，遂表現出野心，要求教會的權力都歸於牧首，而違背社團的期望。¹⁷ 尼康不只想當全俄的牧首，更想居全東正教會之冠。尼康認為，第三羅馬首先不應當在宗教禮儀上與第二羅馬有任何出入。他開始將俄國的斯拉夫語經文同希臘語文本進行對照。¹⁸ 結果發現：自「百章會議」以來，教會斯拉夫語經文與希臘原文之間的差異越來越大。為了使譯文更加忠實於原文，他決定以希臘教會現行的經書為標準，對俄國的祈禱書和教堂禮儀進行修改，¹⁹ 最終使俄國教會在宗教禮儀上同普世牧首區保持一致。²⁰

尼康將儀式做了以下的更改：(一) 不用兩指劃十字聖號，而採用希臘的三隻手指的方式；(二) 哈利路亞是唱三次而不是兩次；(三) 耶穌名字的拼寫從原先的 Исус，改為 Иисус；(四) 洗禮改用灑水禮；(五) 信經中的用字加以更動，如：「我信耶穌基督，上帝之子，是其所生而非所造。」中，「而」字沒有刪略（...”Иисус Христа, Сына Божия, рожденна, а не сотворенна.”, союз ”а” выпущен.）。又如「祂的神國萬世無疆」，舊禮儀派是 ”...Его же царствию несть конца.”，而尼康則採用 ”...не будет конца.”；(六) 聖餐禮時，是五塊聖餅而不是七塊；(七) 十字架遊行環繞教堂的行進方向是由西到東；(八) 其他如聖像的繪製，神職人員的穿著是希臘式的。不蓄鬍子，敬拜的方法，傳統的服飾都依照新的規定等等。²¹

¹⁷ Шахов М.О., *Философские аспекты староверия*. с.34

¹⁸ 所對照希臘文的經本已非古希臘時的經本，而是由耶穌會在威尼斯以及巴黎印刷的版本，連希臘人本身也認為經本已遭曲解了。

¹⁹ 當時對教會傳統更改的本質有一個重要概念，就是聖事禮儀外在物質的形式被認為是其內在神秘與信仰內容的象徵化身，因此外在的形式不是偶然的、不是任意的，不能夠沒有原因的修改。這樣的結果被認為是在傳統上任何原則上的變動的完成不是漸進的，而是非連續的、跳躍的，有具體的日期、原因及創始者，要是修改，便是損壞個人的權威。任何的更改，無論是好的或壞的，在崇拜的外在形式和它內在的思想本質是相關的，需要具體的人和具體的目的。例如，教會聚會或聖人的增補與改變等重要事情的實行是根據出現了必要性或者是為了更正受到異端思想的扭曲。沒有動機或是一代一代漸進演化式的更動是不允許的。參閱 Шахов М.О., *Философские аспекты староверия* с.35.

²⁰ 戴桂菊，《俄國東正教會改革（1861—1917）》，頁 65-66。

²¹ “Журнал Московской Патриархии: Историография старообрядчества”，
<http://www.jmp.ru/jmp/98/7-98/4-1.htm>

反對尼康改革的人，其實並非反對改革本身，因為，為了使教會儀式混亂的情形以及教會生活道德的提升有所改善，改革勢在必行。但反對者認為尼康的錯誤是在於使用了已被異端滲入的希臘東正教的儀式書，在權威性、古老性以及純潔性上因此受到質疑。²²對俄國古代流傳下來的教會禮儀的不尊重與侵犯，自然造成以阿瓦庫姆為首的人們強烈反對。

三、舊禮儀派的出現

事實上教會的分裂並非隨著尼康宣布改革儀式隨即出現，而是當沙皇決定對這群反對改革的人們，進行高壓迫害時，才讓舊禮儀派成形。因為反對者認為沙皇阿列克謝依只是一時迷惑，誤信了尼康，所以在改革初期，阿瓦庫姆仍對沙皇上書，希望恢復舊有的信仰。雖然後來尼康的理想與沙皇的野心有了衝突，但是沙皇至終並沒有接受反對改革者的建言。到了沙皇費道爾 阿列克謝依維奇(Федор Алексеевич)掌權時，維護舊傳統的虔信者，苦心哀求恢復祖先與聖徒傳下的信仰，換來的卻是政府無情的打壓、流放以及處死。²³

既然舊禮儀派站在反對國家教會的位置上，那麼受到國家專政壓迫的農民、工商階級，便向舊禮儀派靠攏。不論他們的動機是否是為了捍衛舊信仰，或是為爭奪被專制政府與教會高層所拿去的自由權利，都因為舊禮儀派的旗幟而受到壓迫。宗教分裂初期的社會中下階層曾與國家政權發生直接的衝突與對抗，例如拉辛之亂(Разин, 1670-1671)與普加喬夫之亂(Пугачев, 1773-1775)，都打著舊信仰的旗幟。²⁴由於舊禮儀派被視為非法的宗教派別，受到政權與政府教會的打壓，這樣的處境使得末世論思想在舊禮儀派中加劇。極端的信徒相信末世即將到來，放棄了世俗的一切，消極的等待世界末日。有的則是積極的反對世俗政權，就像舊禮儀派的精神堡壘索洛韋茲基修道院(Соловецкий монастырь, 在索洛韋茲基島上)不畏死的堅持，使的國家付出了巨大的代價。舊禮儀派的信徒將這些為信仰殉

²²在舊禮儀派擁有權威的《信仰書》(«Книга о вере»)在尼康改革前就已指出：希臘東正教已受到損害，土耳其回教的介入，佛羅倫薩會議，以及羅馬科學的影響，已經使得希臘東正教喪失了純潔性。尼科利斯基，《俄國教會史》，頁 151。

²³“История старообрядческой церкви”，<http://www.kirov.ru/~umcnd/books/oldhist.htm>

²⁴戴桂菊，《俄國東正教會改革（1861—1917）》，頁 199-200。

難的的人尊奉為聖徒，殉道者的思想在俄羅斯北方沿海地區流傳甚廣。²⁵

舊禮儀派本身對世俗的開放程度也有所不同的類型：有的固守舊傳統的鄉村舊禮儀派繼續保持與世隔絕的狀態，不允許自己的孩子進入國家學校就讀，不閱讀非舊禮儀派信徒寫的書，造成其文化水平與政府教會的農民相近。而市民商人出身的舊禮儀派信徒便逐漸接受世俗的文化，將自己的孩子送到世俗最好的學校求學或出國深造，也觀看戲劇演出，閱讀世俗文學，收集藝術品和著名畫家的作品。因此，產生一些支持文學和藝術事業的贊助人，如著名的莫羅佐夫家族(Морозовы)、馬蒙托夫家族(Мамонтовы)、特列季亞科夫家族(Третьяковы)和舒金家族(Щукиных)等。

26

舊禮儀派的產生與自身的再分裂主要是在東正教信仰的範圍內進行。有些舊禮儀派信徒認為教會不可一日無司祭或教士，提議從政府教會去延請教士，以便維持舊信仰，「雖然他們追隨了尼康，但使徒能力並沒有因此消失，他們還是可以用按手禮給主教及教士們授予聖職，只要依照舊禮儀就可以了。」持反對意見的信徒卻認為，那些追隨尼康的神職人員已經失掉繼承使徒的權力，它們是反基督的魔鬼集團，和這些地獄的使者發生關係就是罪惡，被這種變節的主教授職更是污辱。尼康如此的詛咒舊禮儀，而東方大主教都承認他，參加他的異端行為。因此主教團失去神聖性，再也不能有繼承使徒的人，再也沒有合法的教士。²⁷於是舊禮儀派在十七世紀末期，首先分裂出來的兩大派別：承認用舊禮儀的神職人員仍有效力的教堂派(поповщина)和否認其效力的反教堂派(беспоповщина)。由於教堂派仍與政府教會有所接觸，後來受到政府教會的拉攏與威嚇而有所妥協，最後與政府教會殊途同歸。十八世紀，教堂派允許信徒接近政府教會，1800年，一部份的信徒更以皈一教派²⁸(единовѣрие)的身份併入政府教會。反教堂派則始終與政府教會決裂，自己又分成許多派別，有些人趨於非常極端的地步。他們的口號是逃離世界，不與敵基督者妥協。既然沒有聖職人員，

²⁵同上註，頁 294。

²⁶同上註，頁 201-202。

²⁷高驊，楊續譯，赫克著，《俄國革命前後的宗教》。上海：學林出版社，1999年，頁 120。

²⁸皈一教派是受到政府教會的管轄，但儀式、教階和習俗都是依照舊信仰的方式進行。

他們便委任了一些俗世的長者做為領袖，這些人盡量按教會慣例所許可的範圍來主持聖禮，宣講道理與解讀聖經。最早的反教堂派居住在北方沿海地區的維格社區(община Выг)，之後在爭執是否為沙皇祈禱的事情上，先後有費多謝耶夫派(Федосеевцы)以及十八世紀三〇年代菲利波夫(Филиппов)自己帶領追隨者建立的菲利波夫派(филипповщина)。反教堂派內部因對於婚姻、洗禮等聖事的意見紛歧又分裂出朝聖派(старники)，或稱雲遊派(бегуны)。²⁹

第二節 舊禮儀派的精神中心與其發展

受到沙皇國家與政府教會的打壓，舊禮儀派的信徒被迫從莫斯科或其他城市逃往俄羅斯的邊區，所在的環境常是惡劣的森林、沼澤或是荒漠，在那裡信徒建立一個又一個的社區，並以修道院(монастырь)、隱修院(скит)和教堂為中心，作為精神活動的源頭。從十七世紀到二十世紀初，由於歷任沙皇打壓政策的時緩時迫，加上與世俗或政府教會妥協的程度，使得教堂派與反教堂派在各社區的發展有所不同，在當時各有各的精神中心。而在反教堂派中，不願與反基督國家牽連的堅決態度，使得內部不斷地有分裂，產生許多教派。

一、教堂派

十七世紀七〇年代由教士庫茲馬(Кузма)帶領離開庫利什基(Кулишкий)的莫斯科聖徒來到斯塔羅杜布(Стародубье，烏克蘭境內)，因為這裡的自然條件利於躲避政府的追趕以及當地的烏克蘭統治者對來到此地的舊禮儀派信徒相當寬容，還有許多居民的優惠條件，居民在此發展商業。但是政府無情的打擊仍然不停，因此神職人員便再帶領信徒逃到波蘭的韋特卡(Ветка)。短短五到十年的時間，韋特卡發展成了一個大商業中心，控制了第聶伯河左岸烏克蘭和白俄羅斯之間的商業網絡，從俄國來到這裡的新移民也相當多，有四萬多人，像個大城市一般。大量來自各城市的逃亡富商，為了躲避加諸於他們的賦稅和兵役，稱自己也是信徒。彼得大帝(Петр I,

²⁹戴桂菊，《俄國東正教會改革(1861—1917)》，頁295。

1682-1725)在位時，尚未加以摧毀，到了安娜(Анна, императрица, 1730-1740)政府時便進行了第一次驅逐，毀壞了那裡的教堂和修道院，遷移一萬多人，但韋特卡很快地又復甦起來，被遣送回俄國的修士也都再回到韋特卡。到了女皇葉卡捷琳娜二世時期(Екатери́на II, императрица, 1762-1796), 1764年才又對韋特卡進行第二次驅逐，將這個中心徹底摧毀。區民四處逃散，有的到基輔統轄區內的舊禮儀派的村鎮，另一些人則逃到西伯利亞、阿爾泰山以及布赫塔爾馬河(р. Бухтарма)流域，或是再回到斯塔羅杜布。³⁰

另一個早期教堂派的中心是克爾任涅茨河(р. Керженец)地區沿伏爾加河至烏拉爾(Урал)。在十七世紀末時，此處已有七十七所隱修院，住了許多逃亡的修士與神父，十八世紀初，又增加了一些隱修院，變成了舊禮儀派信徒的重要據點。由於這裡的森林與沼澤比斯塔羅杜布更為窮鄉僻壤，是極好的避難所。同時有通往南部和東部的寬廣商道，及伏爾加河與其左邊的各大支流。因此，下諾夫哥羅德地區和伏爾加河下游的主要商業據點很快就掌握在舊禮儀派的手中。十八世紀中葉，葉卡捷琳娜認為舊禮儀派所累積的財富是國家的一筆財政收入，因此希望逃亡在外的舊禮儀派信徒能回到俄國來，給予寬容與優待：允許不刮鬍子，可穿舊式服裝，取消雙倍人頭稅的敕令等等。而政府為國外舊禮儀派提供的移居地點是薩拉托夫邊區(Саратовский край)的伊爾吉茲河(р. Иргиз)流域。1762年的「詔書」(манифест)讓舊禮儀派在這裡發展迅速，到十九世紀初都占有十分獨特的地位。不僅吸引了從波蘭等國外返回的信徒，也招來國內各地的舊禮儀派信徒、農民、士兵與神職人員。在伊爾吉茲河流域的兩岸建立一些自由的村鎮，移民從事農耕、漁業生產等，生活逐漸安定下來。³¹

對教堂派來說，神職人員的獲得也成為教會急迫解決的問題。由於政府教會已被認為是異端，因此是否與之妥協，也使得教堂派內部有不同意見。一是對來自政府教會的神父，必須重敷聖油；另一是只要對異端進行詛咒即可。前者是表現舊禮儀派教會的特殊性及其與政府教會的區別，

³⁰參閱尼科利斯基，《俄國教會史》，頁 267-270；“История старообрядческой церкви”，<http://www.kirov.ru/~umcnd/books/oldhist.htm>

³¹尼科利斯基，《俄國教會史》，頁 271-275。

而後者則是與政府教會的和解，如「皈一教會」。到了十九世紀，教堂派恢復自己的神職人員體系，使得教會能夠繼續發展，並繼續爭取政府給予的合法地位，已不再受到迫害。二十世紀初，教堂派已能以充分的資金以及自己的教階制度來進行活動，建立新教堂、出版刊物、公開舉行宗教會議和代表大會等³²。

二、反教堂派

反教堂派主要分佈地區在北方沿海，範圍在奧涅加湖(Онежское озеро)和白海(Белое море)之間。從十五世紀起，這裡就建立了一些小村，而教會在此處的情形也很特殊。這裡很少教堂與神職人員，因此新生嬰兒常很久都尚未受洗，成年人也少有機會告解或領聖餐，葬禮結婚都沒有神職人員，世俗人誦念沒有儀式性質的彌撒，然而宗教分裂帶來了修士與神職人員。³³

維格社區(община Выг)是反教堂派的精神中心，雖然十九世紀中期被摧毀，但在反教堂派的各派別中，社區的發展與精神遺產，都有深切的影響。北方沿海派的創始人丹尼拉 維庫林(Данила Викулин)以及杰尼索夫兩兄弟(Андрей и Семен Денисовы)，他們在維格社區建立修道院，招來了農民與吸納了來自索絡韋茲基修道院逃出的修士們。社區的管理是按照修道院以及共財的觀念進行的，堅持貞潔不婚的觀念以及財產的共有，經濟情況從原先的困難漸趨富裕，對外的接觸也與日遽增。但在婚姻的實踐有兩方面的困境，一是缺乏神職人員的祝福儀式，另一是繁衍人類的聖訓必須遵守，因而北方沿海派對婚姻採了妥協的態度，結婚必須懺悔，並接受小教堂負責人的祝福才行。而最早對反基督王國代表的世俗政權的絕不妥協，也隨著經濟需求有所鬆動，上述婚姻與反基督的兩點造成北方沿海派的分裂。起先在於是否為沙皇祈禱的爭執上決裂的費多謝耶夫派，創始人費奧多西 瓦西里耶夫(Феодосий Васильев)在波蘭建立了一些反教堂派的

³²參閱尼科利斯基，《俄國教會史》，頁 280-281；Рябушинский В.П., *Старообрядчество и русское религиозное чувство. Русский хозяин. Статьи об иконе*. Москва-Иерусалим: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Мосты», 1994. с.86-88.

³³Смолич И.К.,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церкви*. Книга 8, часть 2,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Спосо-преображеский Валаамский монастырь», 1997, с.119

社區。1710 年左右，他試圖在俄國其他地區也建立社團，但沒有成功。直到女皇葉卡潔琳娜的敕令頒佈，在莫斯科的變容節關卡(Преображенская застава)外才有了費多謝耶夫派的社區組織，擁有小教堂、養老院和墓地，因此這教派又稱為變容節派(преображенцы)。不過此時教派也不得不放棄不為沙皇祈禱的堅持，而與北方沿海派的差異便剩下對婚姻的見解了。因為費派是堅持清教徒的觀念，實際上卻無法節制自己的慾望，而成了其他教派抨擊其淫亂的口實。婚姻問題也使得自己內部在分裂出新郎派(Новожена)，同樣在北方沿海派也有類似情況，產生莫寧派(Моницы)，新北方沿海派(Новопоморцы)等。³⁴十九世紀到二十世紀，反教堂派主要是以北方沿海派以及費多謝耶夫派在發展上的勢力互有消長，但相較於教堂派，影響就顯得較小。

雲遊派是西元 1770 年由葉夫菲米(Евфимий)所領導的派別。他認為城市生活如同巴比倫(墮落罪惡之城)，於是號召信徒們放棄土地財產，因為那是使人淪為安逸生活的羈絆。他號召說：「土地應屬於上帝，人們只有集體的來使用它，卻不可以擁有它。」藉著口號：「丟下你的父母，背起你的十字架來追隨我走」，葉夫菲米及其弟子們吸引了不少的信徒，他們離開城市和家鄉去過那游牧般生活，因此被稱為雲遊派。歸入這自稱「真正基督徒」教派的信徒們，在日後都要變為雲遊者。皈依這教派之初，信徒利用夜晚，在人跡不到的地方舉行雲遊者的洗禮。他們將自己的護照毀掉，另取一張紙，上面畫個十字架，作為真正的護照，這護照是由耶路撒冷簽發的。之後雲遊者便帶著一只木碗、湯瓢和一個小聖像行走天涯。他們都要求獨身，雖然因為肉體的軟弱，常有逾矩的行為，不過他們認為那樣總比結婚好。因為，一個結婚的人，就永遠落到罪惡中去了。當這一教派發展到人多時，就不能人人都去雲遊，勢必要有招待那些雲遊的當地人，保護並提供雲遊者居住的人。這一些人就成了雲遊派的新成員，等到這些人覺得自己可以捨棄財產，才真正成為這教派的主要信徒。政府用盡方法想剷除這派的人，可是他們越受迫害，跟隨的人就越多。³⁵

³⁴參閱尼科利斯基，《俄國教會史》，頁 286-302；Смолич И.К.,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церкви*. Книга 8, часть 2, с.120-126.；Зеньковский С.А., *Русское старообрядчество. Духовные движения 17 века*. München: Wilhelm Fink Verlag, 1970, с.453-457.；

“Поморское согласие”，<http://religion.irk.ru/chr/east/prav/star/bpop/pomor.htm>

³⁵參閱高驊，楊續譯，赫克著，《俄國革命前後的宗教》，頁 124-125；Смолич И.К.,

充裕的經濟發展使得杰尼索夫兄弟有金錢可以從國內各地購置書籍、聖像來作為教會抄寫人員、詩班人員和聖像畫畫家學校成立的資源。在這邊的學習者必須保留下舊有的傳統，並與尼康派份子戰鬥。由於杰尼索夫兄弟的努力，讓維格社區的精神成了舊禮儀派的宗教文化中心。³⁶確實，我們發現維格社區的書籍製作與撰寫、聖像的畫法、與日常物品的裝飾，都有嚴格的規定與特色，保有宗教分裂前教會的傳統。³⁷在維格文學流派(Выго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школа)中，更實際保留了古俄時期的種種體裁的作品：聖人傳記、歷史敘述、故事、異象、宣教、書信、論辯性文章，儀式用文體及詩篇等，也造就許多作家與有學識之人。進一步說來，維格文學的主要目的與其說是保留了古俄文學傳統中某些人們熟知的體裁，不如說是承行了基督教文章的基本意義：就是餵養人們的靈魂，教導人們於人世間行正義的道路。³⁸正是這作為古俄教會虔誠性的最後捍衛者與保留者的強大精神力量，幫助舊禮儀派信徒不僅克服了追趕壓迫，更帶給俄國從十八世紀到二十世紀豐厚的經濟、文化、宗教的寶藏。³⁹

一般說來，反教堂派可歸結下列特點：(一)從來沒有主教，他們一開始就拒絕高級神職人員；(二)如此的結果便是在聖事上有所不同於政府教會，有所謂必要(洗禮、告解和聖餐)和非必要的聖事(按手禮)的分別；(三)反教堂派的教義，教導上具有明顯的理性；(四)雖然反教堂派缺乏神職人員，而在一些儀式上有新的作法出現，但反教堂派信徒仍然相信它們保存了舊信仰，因為在彌撒時，堅持使用的舊有的書和儀式。⁴⁰

第三節 蘇聯時期東正教會的發展

俄羅斯接受東正教後的一千年歷史中，經歷了五個階段：基輔羅斯、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церкви. Книга 8, часть 2, с.128.

³⁶Смолич И.К.,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церкви*. с.121.

³⁷參閱 Байдин В.И., “Традиции и быт старообрядцев”,
<http://heritage.eunnet.net/oldbelief/main/ch4/index.htm>

³⁸Бахтина О.Н., *Старообрядче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и традиции христианского понимания слова*. с.193.

³⁹參閱 Юхименко Е.М., “Старообрядческая столица на севере России”,
<http://oldbelief.chat.ru/senatov/philos.htm>

⁴⁰Смолич И.К.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церкви*. Книга 8, часть 2, с.129.

蒙古統治、莫斯科公國、帝國時期，以及蘇聯時期。其中以蘇聯時期的時間最短，僅僅七十四年。然而對東正教會而言，這段時期卻最為艱難，所面臨的情況也最為特殊。因為先前的時期，雖然教會與國家政權時而發生衝突，但是教會仍受到尊重。但是蘇聯時期反宗教及無神的無產階級國家政權，是企圖要消滅宗教，迫害信仰的，當然對東正教會的迫害也是空前的。在蘇聯執政的七十四年，以宗教與國家關係的角度來看，大致可以劃分成五個時期。一、革命後開始的宗教被鎮壓與權利剝奪時期（1917—1941）；二、政教關係轉入正常化時期（1941—1945）；三、宗教由潛在復甦到萌發繁榮時期（1946—1958）；四、赫魯雪夫再一次鎮壓宗教時期（1958—1966）；五、由宗教復興逐步走向宗教熱潮時期（1967—1991）。⁴¹

以上述分期看來，諾索夫經歷異象時以及完成《異象》前的教會歷史，是遭受嚴重迫害鎮壓的一段時期。因此本節對蘇聯時期的東正教會發展分一、蘇共的反宗教與對東正教會的迫害；二、無神論的宣傳行動與信仰的維持兩部分作簡要說明。

一、蘇共的反宗教與對東正教會的迫害

蘇聯共產黨治國的理念是奉馬列主義思想為準繩，而馬克思認為宗教信仰，是人類奴隸制的反映，若要解放無產階級以及全人類，必須克服人類相信與依靠上帝的弱點。他著名的口號「宗教是人民的鴉片」，⁴²企圖改造人的意識，使人成為戰鬥的無神論者。列寧以為宗教問題不是個人問題，也不是思想問題，而是革命問題。因此，反宗教的鬥爭，不是科學的啟蒙運動，乃是一階級鬥爭。列寧革命成功，取得政權後，也清楚知道東正教教會的影響力，起初避免與之正面衝突，以防止教會投入反革命的陣營。其所採取的是分化策略，強調東正教教會與共產主義並存的理論，意欲吸收教會的妥協份子成為蘇共統戰的工具。另一方面則對宗教教育、制度以及教堂進行破壞，以收恐嚇之效。為了適應俄國人民宗教信仰的虔誠與俄

⁴¹傅樹政、雷麗平著，《俄國東正教會與國家（1917—1945）》。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年，前言頁2。

⁴²馬克思認為：宗教的苦難既是現實苦難的表現，又是對這種現實苦難的抗議，宗教是被壓迫生靈的嘆息，是無情世界的感情，正像它是沒有精神狀態的精神一樣。宗教是人民的鴉片。參閱《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頁453。

國宗教的複雜狀況，列寧是採取機會主義的立場來處理俄國境內的宗教問題，而其後的領導人，從史達林、赫魯雪夫到布里茲涅夫都曾順應革命情勢、國家社會發展而隨時調整其宗教政策。⁴³

蘇聯執政時期對東正教教會進行的迫害手段是多方面的：(一)在法律上規定政教分離、停止宗教教育、禁止向青年人傳教、教會財產收歸國有，剝奪各種宗教神職人員的許多權利；(二)大規模地關閉教堂、破壞聖像、迫害傳教人員；(三)積極進行經濟建設、文化革命、太空探險⁴⁴，間接打擊宗教信仰；(四)改造教會為勞改營、俱樂部，以侮衊教堂的神聖性。⁴⁵

1918年1月23日由人民委員會公布「關於教會同國家分離和學校同教會分離」的法令，其中第二條規定：在共和國境內，禁止發佈任何或限制信仰自由，或以公民的宗教信仰為理由而規定的優先權、特權的地方性法律或決議。第九條規定：學校同教會分離，在一切講授普通科目的國立、公立、和私立學校中，禁止講授宗教教義。⁴⁶法律規定雖然不排斥任何宗教信仰，但實際上，有宗教信仰的人通常會遭受歧視與迫害。神職人員除了可以在教會內進行宗教儀式的自由之外，教會其他權利都遭剝奪。教會不得為受洗的成年人成立研習的團體，也不能為婦女、年輕人以及學童安排特別的宗教服務。而法律卻使得政府可以霸道地迫害教堂及其家人。1918年與1924年的憲法將所有的神職人員及其家屬視為「缺乏勞動的一群」，剝奪其選舉權。而在居住問題上，也課以神職人員重稅，使其生活艱困。

暴力的反宗教運動也屢見不鮮，教堂被蓄意的破壞，秘密警察(КГБ)時而衝進人民的住屋，將聖像毀壞。地方政府也貫徹對信仰者的監控，目的是要讓人民遠離信仰。史達林掌權時，許多有權力的教會被關閉或受密

⁴³熊自健，蘇聯境內宗教份子的反抗活動，《問題與研究》第19卷第9期。台北：國際關係研究中心，1970年，頁78-79。

⁴⁴諾索夫在《在空中的空間》反倒藉由上帝譏諷作者對宇宙探險的自傲，寓意了輕視信仰的罪過。參閱 Багдасаров Р., “На колеснице мучения: Об эсхатологических видениях печорского писателя-старовера”, http://religion.ng.ru/printed/printing/2000-1-26/7_suffer.html

⁴⁵熊自健，蘇聯境內宗教份子的反抗活動，頁79。

⁴⁶相關法令請參閱黃雅芳，東正教在蘇聯解體前後政教關係之探討（一九八五年至一九九七年），碩士論文，政治大學俄羅斯研究所，1998年，頁34；傅樹政、雷麗平著，《俄國東正教會與國家（1917-1945）》，頁34。

亦警察的監督，二次大戰初期，在蘇聯政權建立初期存在著的一千多個修道院中，沒有一個開放，信徒遭到逮捕與整肅；神職人員數量也銳減，禮拜堂也只剩下不到百個。

「集體化」的政策，神職人員所有的土地便收歸國有，而教士必須繳納高額的所得稅，更有被軍隊派遣去做勞役服務。大規模的農業集體化與高額稅收，使得無能力負擔的人被控蓄意逃稅，政府當局視其為破壞蘇聯工業化與五年計劃的行為，有時甚至判為死刑。數以千計的教堂被政府關閉，有的教堂拿來當作非宗教性的使用。政府對待教士如同對待富農一般，許多神職人員被集體流放到西伯利亞，不然就是被關到集中營的監獄中。⁴⁷

二次大戰期間，由於蘇聯與德國對抗，全國上下一心投入護國戰爭，抵抗外侮，史達林也對教會暫時地讓步，暫停對神職人員的迫害和關閉教堂的行為，他利用宗教的號召力來動員全民，發揮人民的愛國心。東正教教會此時終於有些許喘息的機會，表面上雖有懷抱國家對宗教政策寬鬆的希望，但是蘇聯當局並沒有就此放棄以往的宗教政策，對宗教團體仍是懷有敵意的。

赫魯雪夫上台後，以及繼之的布里茲涅夫，在反宗教的戰役上。仍舊不斷地繼續進行。此時教堂的數目比戰前減少了一半，剩下不到七千五百座；神學院也減少了一半，修道院也不到八所有開放。1964年春天，蘇共還在一處宗教聖地的附近建立一所國立無神論博物館，以打擊東正教神聖的形象。⁴⁸

二、無神論的宣傳行動與信仰的維持

在無神論的宣傳行動方面，蘇聯時期組織了「戰鬥無神論聯盟」(1925年成立)、「全蘇宣導科學與政治知識協會」(1947年成立)，從事無神論運

⁴⁷Pospelovsky Dimitry V., *Soviet studies on the church and the believer's response to atheism*. London: The Macmillan Press, 1987, p.64.

⁴⁸李界平，蘇俄的反宗教鬥爭，《問題與研究》第6卷第11期。台北，國際關係研究中心，1967年，頁41-45。

動。他們將無神論滲透整個教育系統，並準備讓「科學的無神論」在學校中成為每人必修的課程，而其他的課程也不能與無神論的觀點相抵觸。在無神論的宣傳中，出版業所扮演的角色相當重要。每年發行數億冊出版品，各種各樣的無神論書籍大量出版。從大專院校的嚴肅書刊，到為小孩而編著的美麗書刊，以蘇聯境內的各種語言印製，並巧妙地與歷史相結合。此外，報章雜誌幾乎天天都刊登無神論的文章，而專寫無神論的期刊也在此時隨處可見。

赫魯雪夫在無神論教育的演說上說明了蘇聯的教育目的，是要讓人民從宗教的侵害與迷信中解放出來，這些都是阻止人民善用創造力的東西。1962年2月，「全聯邦科學無神論宣傳會議」在莫斯科召開。會議強調邀發展有效率的、考慮周密的無神論教育體制，以徹底摧毀人民的宗教思想。1963年6月，蘇共的黨中央委員會揭示所有黨員有義務去進行反宗教的鬥爭，並發展科學無神論的工作。之後，共黨在其社會科學學會中設置了一個科學的無神論協會，其主要工作為協調與指導無神論領域中的所有科學性工作。特別刊物《科學無神論問題》（“Problems of Scientific Atheism”）每年發行兩次，而在大學裡，科學無神論的基礎課程是屬於必修科目。⁴⁹

面對蘇聯政府一波又一波的反宗教打擊，不願妥協與放棄信仰的虔誠信徒，在這場鬥爭中表現出了四種型態：（一）保持個人的信仰，不參加任何教會活動；（二）組織地下教會活動；（三）依舊參加合法的教會活動，但對領導階層表示不滿；（四）積極的反抗。

舊禮儀派作家基林（Килин А.К.），在其《舊禮儀派信徒的思想與思維方式》（«Мысль и мышление староверов»）中也提到集體化的時期，不管是有學識或普通老百姓都做好掩蔽，甚至戴上自製的面具，只留下眼睛和嘴巴。人們為了保持信仰，即使環境如此混亂惡劣，他們仍不丟失良善的心靈。二十世紀格拉西莫夫（Герасимов А.）的作品《杜布切斯基隱修院的小說》（«Повесть о Дубческих скитах»）也嘲諷了政府官員的在集體化時期的狂妄

⁴⁹黃雅芳，東正教在蘇聯解體前後政教關係之探討（一九八五年至一九九七年），頁44-45。

粗暴，掠奪財物的喪失良知，並將他們視為反基督。⁵⁰

雖然東正教教會在蘇聯時期受到打壓與極大的創傷，蘇聯政府一直想要消滅境內宗教信仰的政策，可以說並沒有成功。因為東正教信仰對人民的影響始終深遠有力，縱使在蘇共的恐怖統治下，它仍是人們心靈的最佳避風港。俄羅斯人的精神身處固守著東正教的傳統思想，教會為人權與信仰的奮鬥，是不會輕易被擊垮的。

小 結

堅持遵守古俄教會傳統的舊禮儀派，經常為捍衛東正教信仰的純潔性，而在與政府教會與帝國抗爭之時，表現出激動壯烈的行為，但不管政府如何打壓，舊禮儀派依舊不放棄其信仰。縱使政府是盡力想瓦解舊禮儀派，但舊禮儀派卻是回應以強韌不屈的生命力。⁵¹雖然在舊禮儀派內部也常因神職人員的看法、婚姻問題、過份世俗而墮落的問題、或是對反基督王國的詮釋不同而有分裂，基本上對古俄留下的教會傳統，皆遵行不悖。在這樣的背景下，身為北方沿海派的諾索夫，縱使度過蘇聯時期的無神意識型態的生活，但在經歷異象之後，仍然要堅持信仰的重要並宣告自己的信仰。秉持維格社區所留下的精神遺產與文化薰陶，諾索夫也擔任了反教堂派中，教誨眾人的精神導師。

⁵⁰Бахтина О.Н., *Старообрядче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и традиции христианского понимания слова*.с.210,227-228.

⁵¹Рябушинский В.П., *Старообрядчество и русское религиозное чувство. Русский хозяин. Статьи об иконе*. с.101.